

# 國家意志與科學取向： 建國以來《新針灸學》的 流播與嬗變

• 肖 雄

**摘要：**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強勢影響下，針灸知識藉由女針灸學家朱璉所著《新針灸學》(1951)被重新建構、生產與傳播。本文研究發現其流播與嬗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十世紀50年代前中期，《新針灸學》成為新中國「科學化」的針灸經典，得到國家大力推廣，作為各地針灸教材節選、改編的對象；第二階段為50年代中後期，朱璉及其《新針灸學》遭受政治衝擊，跌落神壇，江蘇省中醫學校所編的《針灸學》取而代之，成為針灸學向全國普及的官方教材；第三階段為60年代後，《新針灸學》隨作者在政治運動中的際遇南遷廣西，成為地域性醫學流派，亦逐漸褪卻政治色彩。《新針灸學》對傳統針灸理論的「科學」重構，在不同階段表現出複雜甚至矛盾的面向，是中共政治意識形態及其「科學觀」共同塑造的結果。該書在數十年間沉浮的經歷，也反映了傳統醫學（中醫）在國家意志與科學取向下的遭遇與發展困境。

**關鍵詞：**《新針灸學》 傳統醫學（中醫） 朱璉 意識形態 科學取向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延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綱領，對傳統科學文化進行大規模改造。國家政權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掌控與管理逐步介入各個具體層面，包括對醫學知識的重新建構、生產與傳播。女針灸學家朱璉所著《新針灸學》(1951年3月首次出版)以「新」命名，彰顯與「舊」針灸學的不同，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受到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由官方出版並在全國普及的針灸專著<sup>①</sup>。其在二十世紀50至80年代的流播與嬗變，從一個切面展

\* 課題資助：2023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共建課題「國家治理視域下廣東省『針灸推廣』的歷史研究與經驗總結(1951-1978)」(GD23XZL07)。

現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國家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傳統醫學（中醫）之發展。

目前學界對《新針灸學》的研究主要基於學術史視角：一類為針灸或中醫通史性代表著作，介紹《新針灸學》的主要內容與歷史價值<sup>②</sup>；一類側重於考察朱璉的生平及其針灸事業<sup>③</sup>。泰勒 (Kim Taylor) 從政治角度討論了中共革命對《新針灸學》成形與發展的影響，認為《新針灸學》將傳統針灸理論「科學化」是接受中共革命塑造的結果，並服務於中國革命<sup>④</sup>；張樹劍則從「中醫科學化」方針的浮沉來審視和考察《新針灸學》在二十世紀50年代的命運<sup>⑤</sup>。雖然上述學術成果具有一定開拓意義，但並未對《新針灸學》的流播與嬗變及其歷史意義作整體研究，也忽視了「中醫科學化」等一系列中醫政策背後強大的國家意志。「中醫科學化」的提法雖在50年代中期之後銷聲匿迹，卻並不代表中共放棄以「科學觀」改造傳統醫學。事實上，《新針灸學》在各歷史階段表現出複雜甚至矛盾的面向，正是中共政治意識形態及其科學觀共同塑造的結果。《新針灸學》的境遇，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中國傳統醫學面對中共的國家意志與科學取向的矛盾與自我調適。這正是本文研究的關鍵所在。因此，本文在爬梳一手文獻史料的基礎上，結合社會文化史的視角與研究路徑，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闡述。

## 一 《新針灸學》的問世

### (一) 毛澤東的科學觀與中醫觀

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陝甘寧邊區召開文教工作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題為〈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話，提出以「團結」與「批評、教育和改造」為統一戰線兩個原則，並指出「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份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陝甘寧邊區政權被認為是新中國的雛形，毛澤東在此具有絕對政治地位和領導話語權，他認為，邊區由來已久的中西醫不睦不能簡單歸於醫療衛生問題，而屬於文化（意識形態）工作的一部分。中醫的「落後」是中西醫問題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果「新醫〔西醫〕……不聯合邊區現有一千多個舊醫〔中醫〕和舊式獸醫，並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sup>⑥</sup>。毛澤東此番講話不僅將西醫作為幫助中醫提高水平和走向團結的主要力量，更表露出其本人如何看待科學和中醫。

五四運動前後，青年毛澤東閱讀了大量譯介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書刊<sup>⑦</sup>。在「新一舊」二元對立話語體系的近代中國，西方科學思潮成為主流，而中醫被貶斥為「舊醫」、「不科學」<sup>⑧</sup>，中西醫矛盾儼然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儘管毛澤東早年曾寫下「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之語，顯示其對中西醫的辨證認知<sup>⑨</sup>，但此後「舊醫」一詞的使用，反映毛澤東的中醫觀亦受近代科學思潮影響，與當時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並無本質區別。